

黎小龙 张文 主编

ZHONGGUO NANFANG MINZUSHI LUNJI

南方民族史论集

——邓子琴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黎小龙 张文 主编

中国

ZHONGGUO NANFANG MINZUSHI LUNJI

南方民族史论集

——邓子琴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南方民族史论集

——邓子琴先生逝世 20 周年纪念文集

黎小龙 张 文 主 编

责任编辑:卢渝宁

封面设计:王正端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庆·北碚 邮编 400715)

网址:<http://www.xscbs.com>)

印 刷 者: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0.75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2 月 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621-3370-0/K·113

定 价:25.00 元

前 言

1984年迄今,邓子琴教授逝世已届20周年。先生一生,为人宽厚,淡泊名利,人们习称“子琴先生”。故世后,历史系同仁、后学以“躬自厚,薄责于人”(悼词语)、“大智若愚”评价先生,是为公议,也是对先生最由衷、贴切的感佩之辞。

子琴先生早年潜心于中国礼俗学、佛教思想文化和隋唐史研究。礼俗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礼俗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田野调查的方法和手段亦必学习和运用,这为他后来调查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奠定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和积累。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全国性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近十年的调查研究,子琴先生是积极的倡导者和主持人。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对象,重点是西南彝、藏、羌诸族,也曾远赴内蒙古考察其游牧社会结构。因条件所限,当年考察之艰辛和努力,在先生的吟诗中颇多反映,兹引数例:

凉山彝区考察(1959年)

岷江渡后又青衣,邛坂盘旋来去迟。
直上凉山探遗史,辛勤小队南征时。

甘孜藏区考察(1960年)

踏雪四千公尺上,洪荒古木映寒流。
敲冰煮雪高楼座,一夜八邦火不休。

阿坝藏区考察(1961~1962年)[冬季]

才离草地又嘉绒,草草匆匆又一冬。

此去还循灌口路,巴山遥指数归踪。

在子琴先生的带动下,历史系的许多中青年教师在那一时期均先后参加了深入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的社会调查,由此形成了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研究方法与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学术风气与学术传统。“文化大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大多禀承了子琴先生奠定的这一传统。长期以来,民族史学,特别是中国南方民族史的研究,成为历史系教师、研究人员数十年逐代承袭、不断探索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这部文集收录的论文,包括了子琴先生以来的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三代学者、教师的部分研究成果,其意在客观展现数十年来历史系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的学术传承轨迹。这应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和缅怀。

黎小龙

2004年末于北碚文星村

目 录

邓子琴先生民族史研究及学述

- 邓子琴史学成就述略…………… (何汝泉)1
- 从少数民族社会的考察和研究来看
- 西周社会性质问题…………… (邓子琴)16
- 四川藏族地区“民改”前农奴制的成长和变化 …… (邓子琴)36
- 从有村社残余现象的部落到封建领主制
- 即将形成的部落…………… (邓子琴)53



巴蜀文化研究

- 试论巴文化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递…………… (李世平)64
- 试论廩君蛮迁徙的方向
- 《水经·夷水注》释读新得…………… (柳春鸣)76
- 巴蜀古王考…………… (张 文)84

南方民族源流研究

- 对白族起源、形成和名称由来的看法…………… (杜 昆)99
- 渝黔土家族族谱与土家大姓之土著渊源考…………… (黎小龙)112
- 从民族学资料看家谱的起源…………… (黎小龙)127
- 嘉绒族源初探…………… (邓廷良)142
- 从汪公等民间信仰看屯堡人的主体来源…………… (蒋立松)156

南方民族经济史研究

“刀耕火种”重评

——兼论经济史研究内容和方法…………… (蓝 勇)167

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性

贫困形成的影响…………… (蓝 勇)178

福康安整顿广西中越边贸述论…………… (张明富)199

鄂尔泰与云贵边省经济开发…………… (张明富)215

山地生境与贵州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的

形成及其特征…………… (蒋立松)228

南方民族社会史研究

南诏社会性质质疑

——兼论白族历史有无奴隶制…………… (杜 昆)241

文翁治蜀考论…………… (何汝泉)253

周秦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

形成与嬗变…………… (黎小龙)270

论僚人入蜀及其意义…………… (卢华语)283

两宋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与社会控制…… (张 文)297

两宋政府的少数民族赈济措施刍议

——兼论宋朝民族政策的转变倾向…………… (张 文)313

后 记 …………… 334

邓子琴史学成就述略

◆ 何汝泉

邓子琴(1902年~1984年),又名邓永龄,云南永善人。生长在文化氛围浓郁而经济境况困乏的家庭。伯父、父亲是前清秀才,自曾祖父以来均以教书为业,无有田产。半岁,父亲辞世,仅靠母亲佃种田地和做小生意维持家庭生活。尽管家庭经济困难,上学求进却能坚持不懈。高小毕业后,特选有公费的师范学校就读。上大学,也是由省教育厅选送津贴以读成都高等师范学堂。

邓子琴在成都高师国文部学习时,致力于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追求在学术上有一技之长,打下了扎实的语言文学的基础。同时,由于受一位同学的影响,读了许多佛教经典,也爱看先秦诸子和哲学书籍。1927年高师毕业时,因随学校组团去华东参观教育的机会,在南京参加第四中山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解放后的南京大学)插班考试,被录取进入哲学系,受业于著名的佛教史学者汤用彤教授和佛家哲学学者熊十力教授。从此,便以佛学作为自己的深造领域,进一步坚定了走学术研究的道路。中大毕业后,曾短期在该校做助教,也曾回云南执教。1935年再度北上,任教于乡村建设研究院山东菏泽分院,担任“中国文化要义”课教师,重点讲授中国历史上的典章制度。他后来回忆说:“我专力搞历史这门学问,也是这时才决定的。”此后,尽管辗转各地,在各种学校任

1

邓子琴先生民族史研究及学史

教,担任诸多课程,同时致力于学术研究,但大体上都围绕中国文化历史进行。可见,邓子琴走的是一条文学—哲学—史学、文史哲贯通的治学道路。这既是他治学的特点,也是他进行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优势所在。

如果从1928年中山大学毕业算起,邓子琴有50多年的学术研究生涯,其主要成就在史学,可分为佛家哲学和佛教史、礼俗风俗史、隋唐五代宋辽金元史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等四个方面,兹分别略述于后。

一

邓子琴在成都高师国文部学习时,对文字音韵学很有兴趣,用力甚勤。曾经写过一篇《模为元音说》的论文,在国文学会刊出,颇受师友的关注。这时打下的语言文学基础,和他后来“偶有吟咏,以抒心怀”,写有不少格律严谨的旧体诗^①是有直接关系的。可是,就在这时,他已开始涉猎佛学。不过,使他真正走上研究佛学道路的,主要是中大的导师汤用彤和熊十力。

汤用彤和熊十力是邓子琴在中大读书时最亲近的老师,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当时汤用彤亲自教他学习巴利文(印度文字的一种),希望他将来翻译佛经。^②和熊十力更是朝夕相处,常常一同外出散步,谈论学术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迎接熊先生来川,住在璧山自己家里,随时讲论,因此,对熊十力的学问体系的

^① 邓子琴的诗作有《师马鹤斋诗录》,系从1927年~1976年间所作诗中选出的50余首,由勉仁文学院学生饶遂道等编印成册,作为八十寿辰之庆祝;另有收入《四川省地方史研究资料丛刊》第2辑《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集》的《民族社会考察纪行诗抄》54首。其余尚有不少,不知所存。

^② 1933年邓子琴在云南省教育厅工作时,翻译了印度旁遮普大学渥勒教授梵文原著《印度阿输迦王石刻》一书,由昆明教育厅出版。这可以说是实践汤先生希望的尝试,但后来没有继续下去。

了解更为深澈。^① 1939年,熊十力应邀主持嘉定复性书院,邓子琴亦随之前往。1940年由熊十力推荐,应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约请编写佛教史。这使邓子琴十多年来积累的佛教知识有了用武之地,并且成为他以后多年陆续从事的主要研究课题。可是,那时国事维艰,生活困迫,无法全力以赴,以致这部书稿没能完成。已成的稿件中,又因迁转流徙有所遗失。后来邓子琴病重,历史系派人帮他整理积稿时,发现有《隋唐佛教史》、《佛家哲学基本问题》、《佛家哲学要论》三种稿本。应该说这是邓子琴研究佛教史和佛家哲学仅存的成果。综观邓子琴对隋唐佛教史和佛家哲学的研究,可以看到下述几个特点:

第一,高屋建瓴的视角。邓子琴对中国文化有深厚的根底。这不仅是在成都高师国文部奠定了基础,而且从20世纪30年代在菏泽乡村建设研究分院主讲“中国文化要义”、“国学概论”等课以后,历年的教学和研究,大都可以包括在中国文化的范围之内,所以积累有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广博知识和深刻见解。因此,他论述中国佛家哲学思想,并非就事论事,而是站在中国思想文化的整体高度。他曾经说:“隋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既综合南北朝各自发扬的特点,又吸取西方传播过来的文化精华,创造性地熔铸在中国独特的民族形式中,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容。”“谈中国中世纪哲学思想,是离不开佛教的。所以佛教可以提到学术思想这一范围内讲,也可放一部分在宗教范围内讲。如果排斥佛

^① 解放后,邓子琴曾说:“熊十力先生的哲学,是构成精严庞大体系的。他早年研究新法相宗唯识学。受了法国柏格森影响,因而回转到古法相宗华严学,汇通于中国老庄大义,著成他的大著《新唯识论》,中间颇有辩证法倾向。抗战期间,又稍稍采取黑格尔之说来做说明。熊先生治学过程,大概就是如此。……早年治旧唯识,可说是客观唯心论,到后来的新唯识论,变成绝对唯心论了。但他有一特点,即是以变动发展的观点,来说明‘永恒’,也等于说要用辩证法来改造形而上学。”这是对熊十力治学道路和学术思想最精到的评说。

教于学术思想范围以外,不特我们的思想史缺乏了丰富的内容,并且必然使许多思想的来历搞不清楚。”这里,不仅指出佛教可以提到中国学术思想范围内来研究,而且强调了佛教与中国中世纪哲学思想的密切关系。这是对整个中国思想史有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而提出的精湛见解,也表明他对佛教的研究,正是以中国思想文化作为出发点,也是以中国思想文化作为归宿。

第二,刻意追求的重点选择。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林立,一般说有八大宗,即律宗(又名南山律宗)、法相宗(又名唯识宗或慈恩宗)、三论宗、天台宗(又名法华宗)、密宗(又名真言宗)、净土宗、华严宗(又名贤首宗)和禅宗。有的大宗又有若干小宗。研究者总是根据自己的认识而有所侧重;对于重点的选择,往往又体现研究者的意向。邓子琴对隋唐佛教各宗派的经典学说和师徒传承如数家珍,但是他把研究重点放在天台宗和华严宗上。其用意可以说有这样两点:(1)此二宗的思想作为上层建筑来说,在当时有一定积极作用。如说:“陈隋间的法华经非常流行,天台宗据此成立宗派。法华经的二乘授记、龙女成佛,至少符合当时人民统一希望的。所以,法华经……到陈隋间才大行于世,这不能不说是有环境造成的因素。”又说:“到了隋唐统一后,政治向中央集权方向发展,有强大的集权机构。所以,唐代形成的华严宗,反映了统治者这种政治要求。华严宗谈法界缘起,真性常住,多少反映了君权的永恒性,所以华严宗成为唐朝皇帝喜欢提倡的对象之一,武则天更是显著的例子。”(2)此二宗的思想体现中国思想创造性的发展。邓子琴认为“隋唐的哲学思想,如果就儒学来讲,是没有什么特殊东西的”,这时哲学思想的特点表现在佛教思想上。他指的当然不是那些天竺宗派,而是中国僧徒创立的向中国化发展的天台华严这些宗派,尤其是体现在这些宗派的思想中有“比较高的辩证法因素”上。所以,深入研究天台宗和华严宗,不仅可以理清佛教中国化的脉络,而且是发掘这时中国哲学思想特色之所在。可见,选择天台

宗和华严宗作重点，表现了邓子琴刻意追求的研究方向。

第三，独到的深入领域。讲隋唐佛教，一般都会涉及儒、佛、道之争，或称三教之争。这在邓子琴的研究中都谈到了。如他举出佛道几次争辩来加以论述。^①除此之外，他还触及到一个一般很少涉及的领域，那就是佛教内部宗派的论争。他指出：佛教内部宗派的论争，不是大家开会论辩，也不是在一处争胜负，而是对学理上的问题著书争辩。其激烈的程度，在历史上是少有的。最著名的如天台宗的荆溪，著《法华五百问》来驳斥法相宗窥基著的《法华玄赞》；法相宗的慧沼，著《能显中边慧日论》来驳斥华严宗。他还进一步举出佛教宗派之间争论的问题，如：（1）天台宗与法相宗争论的一乘与三乘问题；（2）天台宗与华严宗争论的教观问题；（3）华严宗与法相宗争论的真心染净问题。他不仅对争论这些问题的复杂内容，能作出简明扼要评述，而且还把有些争论与儒家内部争论的问题作比较，说：“这个本是中国战国时候儒家争论的问题，现在变个形式，体现在佛教宗派中了。这个争论，在佛教衰落后，又变个形式出现在韩愈李翱的论证中。”由此可见，邓子琴对隋唐佛教研究的深度，至今还是一些人望尘莫及的。

二

1943年至1948年，邓子琴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作教授，担任社会事业行政系礼俗行政组的课程，先后讲授过“礼俗通论”、“礼俗考古学”、“伦礼学史”、“风俗史”等课。这些课都没有现成教材，完全要由教师自己编写讲义。邓子琴对中国礼学、风俗史的研究，就是结合这时教学进行的。其研究成果主要有：1947年由南京中

^① 邓子琴举出的佛道几次争辩是：（1）法琳抗辩傅奕上疏；（2）法乘与李仲卿辩难；（3）慧净法琳辩驳辛诤齐物论；（4）慧立驳斥李荣立义；（5）灵辩与道士论驳。另外撰有《晚明临济曹洞二家争辩之问题》，载于《责善半月刊》第20期。

国文化社出版的《中国礼俗学纲要》和1987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的《中国风俗史》(由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漆泽邦等整理),此外还有在《东方杂志》和《中国文化》^①上发表的论文。

《中国礼俗学纲要》第一编“绪论”有九章,依次是:“释名”、“风俗与民俗”、“礼俗与伦理”、“礼俗在中国文化上之价值”、“中西礼俗之比较”、“礼俗变迁”和“研究礼俗之注重点及其方法”等。此编是对礼俗学的理论阐述,包括名词诠释、关系分析、源流梳理、中西比较、文化定位、重点和方法等。在论述中,总是从历代儒家浩繁的论说中,提取出前人的论点,参照近代人文科学理论,加以评价,然后表示自己的看法。第二编“基本六礼大要”,是根据《礼记·王制》分六章叙述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礼和相见礼。每一种礼,大体是首叙其意义、价值或特点,次叙其仪式及对仪式进行解释,再叙其变迁,最后叙其相关礼节或论述有关问题。其论述,总是把《仪礼》、《礼记》以及历代礼学成果融会贯通,或择善而从,或自立新意,并且以图像辅助说明。中国古代,礼目繁多,为什么邓子琴只叙述这六种礼呢?这是由他对礼的总体看法而来的。他认为,中国的礼分为三部分,一是俗礼,即社会的礼;二是幼礼,即教育的礼;三是政礼,即政治的礼。他认为,现在研究礼应当注重俗礼。俗礼,就是《礼记·王制》所说的冠、婚、丧、祭、乡饮酒、相见六礼。这是礼的基本,故称之为“基本六礼”。这些礼之所以应当注重,是因为这些礼节通行于一般社会,本是融化民俗而成,又久而成为一般习惯,故称俗礼。俗礼是礼俗二字的易词。这些看法,至今仍不失其独到的意义。本编在叙述各种礼仪中,有的地方还对中国礼俗中某些特点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述。如在丧礼中,对人的情感生活(喜怒哀乐)的作用作过讨论。在祭

^① 《中国文化》是邓子琴和他的朋友钟芳铭办的刊物,钟出钱,邓出力,即撰文、编辑、印刷诸事皆属之,共出过两期。第1期载有邓子琴评论《北泉礼议录》婚丧礼之文。

礼中,对中国的祭礼与宗教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论述。^①他指出:由于祭礼盛行,使宗教无从成为主宰中国的力量。“知祭礼之多且繁,则无疑于中土宗教之不兴起矣。”“在中国,祭礼兴而宗教遂隐而不见矣。”这是一个至今鲜为人觉的精辟见解。

《中国风俗史》本来有三编。第一编为“宗法时代”(先秦至西汉);第二编为“门阀中心时代”(东汉至唐末五代);第三编为“士气中心时代”,即“泛伦时代”(北宋至民国)。但第一编稿子早丢失,故现在见到的1987年出版的,只有两编。此书每编大体以朝代分章,每章分节叙述诸如政化(政治与教化)、品度(品性、风度)与伦际(人际关系)、民俗(包括节令、信仰、婚俗、丧俗、用具、生日、语言等)、礼俗、一般风气、特殊风气、地方风俗、少数民族风俗等方面的风俗习惯。此书广泛征引了我国的正史、别史、杂史、时令、地理、笔记、游记、稗钞、民歌乐府、古诗词曲等各种资料,内容相当丰富,反映了东汉以来我国各个时代五彩缤纷的社会风貌,各族士民千姿百态的文化生活。邓子琴研究风俗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方法。他曾经对风俗、民俗、礼俗三个概念进行过严格的界定,说:“凡总括一地域或一时代民族一切生活现象,而以价值意义评判论定之者,谓之风俗。”“凡依赖感情生活而有之信仰,惯习及故事歌谣等,存在于未开化民族中,及文明民族之无智识阶级者,谓之民俗。”“凡依理智的指导形成之惯习,构成一定的仪式,而流行于一般的社会中者,谓之礼俗。”并指出:风俗范围广,而礼俗范围狭,在古代,言风俗者,殆无不包括礼俗。民俗,在中国属于风俗一目之下。^②这样,风俗既包括民俗,也包括礼俗。《中国风俗史》涉及的范围,就是按照他这个认识确定的。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结论》中写道:“士人之道德与气节,全恃教化如何而有其升降。教化

① 邓子琴:《中国礼俗学纲要》,中国文化社出版社,1947年,第80页~第82页。

② 邓子琴:《中国礼俗学纲要》,中国文化社出版社,1947年,第7页~第8页。

昌隆之日，即道德与气节发扬之时，则风俗必淳良；反之，则窳弊焉。中国历史传统，教化必恃良君、贤相与夫大儒硕学，朝野相与鼓铸，方为有效。”在他看来，一个时代，风俗之好坏，依靠于道德与气节是否发扬；道德与气节的升降，则依靠于教化；教化之昌隆，则依靠良君、贤相、大儒硕学朝野之鼓铸。还说：“凡一种社会风气，倡之者为一二领袖人物，而形成社会习气后，常绵延至若干时期，逐渐演变，以迄于消歇。在旧有消歇中，新的风气，又逐渐生起成长，代之而起，复为循环，以迄于无穷。”《中国风俗史》就是按照这样的认识来论述风俗的形成和演变的。邓子琴研究风俗史的方法，注重纵横结合。“就一时代而言，谓之纵”，“就一地域而言，谓之横”。他尤其重视风俗与地域的关系，认为风俗与地域的关系最为巨大，考究风俗者，应以地理为主。如果将全国方志（五六千种）中关于风俗部分作系统整理归纳，必会多有发现。但他当时只充分使用了正史地理志的材料，由于条件的限制，还来不及作方志这方面的工作。他还指出，民族之迁徙，文化之含毓，亦有关于风俗。他还提到，研究风俗，应注意游记材料的搜集，注意民俗调查资料的使用等，这在他的书中已尽量这样做了。邓子琴还强调研究风俗的态度，说：“吾人于风俗所注意者，非仅知其演变迹象为足，要须知所以化民成俗，指导邪正之方，遮足为吾人指南也。”这就是说，研究风俗史，不是以仅知风俗演变迹象为满足，而是要知道化民成俗的原因和导致风俗邪恶或淳正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作为当今人们的指南。这也是他研究和讲授风俗史所追求的目标。

三

1950年邓子琴调到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作教授，讲授中国通史课。那时，他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读了《社会发展史》、《资本论》、《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许多马列书籍，一面参加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认

真批判自己的旧思想,逐渐地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在教学和科研中努力实践运用。50年代中期他运用唯物史观编写的《隋唐五代史讲稿》和《宋辽金元史讲稿》,便是结合教学进行中国中世纪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隋唐五代史讲稿》是邓子琴分工讲授这段历史,在课堂用稿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的。讲稿约16万字,分三章^①叙述隋唐五代382年的历史。各章节的内容,是他网罗应有的资料,凭借深厚学识而独立撰写完成的。文字虽然简明扼要,但内涵十分丰富。比如隋朝这一章,据粗略统计,仅已表明的古今中外参考文献就达40多种。对于当时史学界讨论的隋唐五代史的问题,讲稿中都有涉及,并且表示了他的看法,不便在正文中阐述,都在注释中加说明。注释中还记录了他对这段历史的许多研究成果,真知灼见在讲义中随处可以看到。所以,这虽然是一部讲稿,但它的学术性也是相当强的。这部讲稿于1957年由历史系打印装订成册,参加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主办的高校教材讲义展览和交流,受到广泛赞赏,得到的评价是:编者尽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没有客观主义态度,在很多问题上编者独具见解,论证透辟而有力,具有较高科学水平。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50年代我国大陆出版的隋唐五代史,有南开大学杨志玖的和东北师大吴枫的。^②这些都是由教学用稿加工整理而成的。现在把邓子琴的讲稿和上述

^① 《隋唐五代史讲稿》第一章隋朝,分四节讲述“隋之统一”、“隋朝中央集权制度和经济发展”、“隋朝对外关系”、“隋末农民起义”;第二章唐朝,分七节讲述“唐朝的建立与其伟大的规模”、“唐帝国的扩大”、“隋与盛唐时期的文化”、“唐朝统治的危机与安史之乱”、“唐朝后期的经济和政治”、“唐朝对几个民族的关系”、“唐末农民大起义”;第三章五代十国,分三节讲述“五代十国的大势及南方经济的发展”、“契丹的兴起及后周与契丹的斗争”、“唐中期以后到五代的文化”。

^② 杨志玖编写的《隋唐五代史纲要》1955年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吴枫编写的《隋唐五代史》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1954年由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出版的岑仲勉《隋唐史》是另一个层次的教材。

两部出版的书比较来看,其分量相差不大,总体水平大致相当,具体而论则各有千秋。邓子琴讲稿在少数民族和文化特别是学术思想部分,有显著的特色,的确堪称“独具见解”。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邓子琴的这部著作仅停留在交流讲义上,而没有能够正式出版。但是,许多听过邓子琴讲课和阅读过讲稿的学生,已感受到他的研究成果,并把他的观点广为传播。从这点上说,邓子琴这部著作并不因为没有正式出版而不具有其价值。

《宋辽金元史讲稿》的情况,与《隋唐五代史讲稿》大体相似。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这部讲稿,无法具体述说。但是,邓子琴的宋辽金元史研究成就,可以从1940年发表的论文《南宋时代重庆在国防上之地位》^①和1962年出版的《钓鱼城史实考察》^②一书中见到一些。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向中国大举进攻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1940年12月正式定重庆为“陪都”。邓子琴以一个爱国学者特有的敏感性,撰写了论文《南宋时代重庆在国防上之地位》。此文从“南宋时代中国之大势”、“四川在南宋军事政治上之地位”和重庆的地理位置,阐述了重庆在抗击蒙古(元)战争中的重要性;再述重庆知府余玠任用冉玘、冉璞修筑合州钓鱼城,合州知州王坚在钓鱼城率军民英勇抵抗蒙古军的进攻,将大汗蒙哥击伤致死,使南宋国祚得以延长;还以专节叙述张珪坚守重庆,“以一隅而支撑危局”,“重庆以一隅而关系南宋全局”。认为,这是“吾国民族史上最为光荣之一页”,“确为人类最可宝贵之史料而不可磨灭者”,“余玠诸公,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值得“吾人讴歌而赞颂”。最后指出:“今之重庆,值国家空前大难之时,已由边隅而建为陪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已成为中心区域,其重要殆过南宋时万倍。以现代形势而言,尤不能与南宋相提并

① 邓子琴:《南宋时代重庆在国防上之地位》,《贵善半月刊》1940年第2期。

② 《钓鱼城史实考察》196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